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忆西南联大

大师背影

当年那些令人高山仰止、灿烂了中国教育历史星空的大师们，具有怎样的风范，能让世人在今日如此怀念？

不能忘却的记忆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常务副会长胡邦定忆恩师

□本报记者 冯永亮 吴绍芬

1946年，随着西南联合大学办学结束，1942级历史系学生胡邦定告别学习、生活了4年多的母校。如今，近70年过去了，但半个多世纪的风霜雨雪，并没有磨灭胡邦定对母校的眷恋，当年那些令人高山仰止、灿烂了中国教育历史星空的大师们，依旧鲜活地留存在他的记忆中。每每念及恩师，胡邦定总会脱口而出8个字：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记者采访已经93岁高龄的胡邦定，听老人讲述大师风范以及恩师给他的教育。

大师如云

“名师荟萃，群星璀璨”，这是胡邦定对当年西南联大授课教师的第一印象。据他回忆，大一新生的课程基本都是必修课，包括国文、英文、中国通史、逻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伦理学等，均由名家授课。教国文的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担任过英文讲席的有叶公超、钱钟书、卞之琳、查良铮等；而教逻辑学的是名教授金岳霖；教伦理学的是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经济学的是法商学院院长陈岱孙；教政治学概论的是著名政治学家张奚若、浦薛凤、楼邦彦等大师；教社会学原理的先后有陈序经、吴泽霖……无论哪门学科的教师，皆为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大家。

但是，并不是每个学生都能有机会听到大师的课。“比如，西南联大的大一国文课有许多名师任教，而且都是小班，一班不过二三十人。谁分到哪位教师的名下，并不是由学生自选，而是由教务处分配。”胡邦定回忆说，如果当时让学生自己选教师，恐怕朱自清、闻一多等授课的班就会爆棚，而个别学问虽深、但讲课不一定精彩的教师会“门前冷落”。

严格要求

胡邦定很幸运，大一时遇到了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当时吴晗很年轻，1942年时不过33岁，风华正茂，讲课也颇多创新：一般传统历史教学按朝代顺序讲，但他讲课是按石器时代、殷商社会、春秋封建、战国七雄、土地制度、从募兵到征兵、刑法制度、科举制度等专题来讲。“这给我一个启发，对史料要进行综合分析，要多读书；掌握丰富的资料，从中形成自己的观点。泥古不化是不可能有创意、有发展的。”直到现在，胡邦定仍然感激吴晗对自己的史学训练，但当时学生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吴晗的严格要求，“我们这一班学年结束考试的成绩，最低的只得12分，还有59分的，我考了第一名，也不过76分。”

其实，这样的严格是当时西南联大普遍要求的。“学校对学生的学习成绩要求很严，一学年选修学分的1/3不及格就留级，1/2不及格必须退学，从不含糊。”胡邦定清晰记得，当时个别学生对校长梅贻琦严格执行考核制度颇有微词，曾有人在教室的墙外侧用粉笔写上“打倒梅特涅”几个字。这个学生是用1948年维也纳三月革命时，工人、大学生反对奥地利专制独裁首相梅特涅的名号来影射梅贻琦。

但据胡邦定回忆，梅贻琦丝毫不为所动。在一次全体学生参加的“国民月会”上，梅贻琦重申了学习纪律，并且说，国家在抗战时期办学，很不容易，学生如不勤奋向学，应当于心有愧。然后，他气愤地说：“说我们是梅特涅，我们就是梅特涅！但考核标准绝不降低！”

不仅对学生严格要求，教师对自己的要求也从不含糊，哪怕是成名已久的大家。比如被尊称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每每讲课，总是侃侃而谈，引经据典，更难得的是他从不拾人牙慧，“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陈寅恪先生上课，只讲新发现、新见解、新成就，这给了我们极大的震撼，做学问原来是应该这样做的。”胡邦定动情地说，4年大学生活，教师们通过启发和示范，开阔了他们的眼界和思路，教会了他们做人和做学问。

大师风范

在当时的西南联大，不论是在国内成长起来的鸿儒，还是国外学成归来的教授，普遍保持一颗赤子之心。而在诸多教授中，其音容笑貌至今还深深印在胡邦定脑海中的，首推大一时讲授伦理学的文学院院长冯友兰。

冯友兰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多年游学国外和讲学，一般人都设想他一定是一位“国际范儿”的教授。然而当冯友兰第一次出现在学生面前时，却让他们大跌眼镜，冯友兰竟然是一副土得掉渣的老夫子形象：戴深度近视眼镜，三寸长须，着蓝布长袍、黑马褂，足登中式布鞋……

胡邦定回忆，因为西南联大没有能容全部历史系学生的大课堂，教师只能在一片松树环抱的空地上讲课。有口吃毛病的冯友兰，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开场就说：“当年孔、孔、孔子杏坛讲学，我们今天在、在这松林里授课……”

教经济学的法商学院院长陈岱孙，也以“戴两块表”给了胡邦定不一样的感受。陈岱孙是在美国哈佛大学拿金钥匙的博士，每次上课，他都着整齐的西服，打领带，手提一个大皮包。上课时间是上午10时至12时，陈岱孙总是提前三五分钟就在教室门前散步，差一分钟左右就站上讲坛，然后准时开讲。

由于选修陈岱孙经济学的人多，只能在距生活区较远的一个能容纳200人左右的大房子里上课。起初，每当快到下课的时候，有些学生惦记着赶到食堂吃饭，不免有些躁动。陈岱孙就说：“我戴着两块表，绝不会误了你们吃饭的时间。”这种“安民告示”很有针对性，因为西南联大学生食堂一般只管午、晚两顿饭，许多学生是空着肚子来听课的。

往事如烟，胡邦定在回忆恩师们的趣事时，更多的是感念恩师们的培养，比如陈岱孙为他打下了牢固的西方经济学基础，“陈先生讲课，最大的特点是清晰、洗练，没有多余的话，字字句句都让你听得真切。像剥竹笋一样层层剖析经济学原理，从概念到理论体系都给你一个完整而明确的认识”。

人格魅力

胡邦定进入二年级以后，专业课逐步增加，而西南联大历史系的名家甚多，可谓人才济济，比如陈寅恪、钱穆、雷海宗、郑天挺、向达、张荫麟……这些名家中，胡邦定对系主任雷海宗的印象尤为深刻。

“对于雷先生，大家都说他是声音如雷，学问如海，自成一宗。他上课从不带片纸只字，每次讲述许多历史纪年，绝对准确无误。”相对于治学和教学的严谨，胡邦定感受更多的是雷海宗为人师表的力量。

雷海宗生性耿直，不因意识形态的分歧而不顾客观事实。1946年2月25日，西南联大在新校舍图书馆前大草坪为抗议苏军在东北拆机器、强奸妇女等罪恶行径举行演讲会，雷海宗讲得声泪俱下，列举种种事实谴责苏军暴行。在当时，一些拥苏的“左”派学生，包括胡邦定在内，对雷海宗的言行深为不满。

如今，近70年过去了，雷海宗穿越历史的坚持正义的呐喊，在胡邦定的眼里，也变成了深深的崇敬。“现在冷静地想一想，雷先生的义愤是很自然的，作为爱国的、维护正义的中国人，怎么能对苏军暴行钳口无言呢？从这一点可见，雷先生坚持是非的原则精神是很可贵的。”胡邦定激动地说，中国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传统，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历史学家，焉能不顾事实，违心地沉默呢？就这点来讲，雷先生永远都是我们的师表。

铮铮风骨

1942年，胡邦定进入西南联大学习时，刚好20岁，当时饭尽管可以管饱，但没油水，每天饱尝“饥肠辘辘”之感。这也还好，学生毕竟“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教师们就没有那么好的境遇了，“老师比学生苦”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尤其是那些拖家带口的教授。

抗战时期，教授们和大后方广大教职工一样，深受通货膨胀之苦。据统计，抗战前教授的平均工资约为350元法币，同350银元等值。到了1943年下半年，物价上涨了405倍，教授们这时的平均收入为3697元法币，只相当于1937年的8.3元了。以这点微薄的工资实难养家糊口，但教授们坚持含辛茹苦，一边教书，一边科研，许多人把自己心爱的藏书卖掉以补贴生活。

比如闻一多，为了养活一家老小8口人，他还在昆明的昆华中学兼一个全职的教员，但收入仍不够开销，还要靠刻图章来维持生计。再比如吴晗，有一次，胡邦定在早市上看见吴晗提着菜篮子四处转悠，他原以为吴晗是在精挑细选好菜，走近才得知，原来他是在满市场找便宜菜。

“西南联大的教授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本可以生活得不那么艰苦，可以做官，也可以接受政府的特殊津贴，但他们坚守了知识分子应有的风骨。”胡邦定回忆说，教育部有一次要给所有担负行政职务的教授特殊津贴，但25位兼院长、系主任的名教授为了与全体教师同甘共苦，毅然拒绝，这让学生们深受感动。

“这是何等胸襟，何等风骨，怎能不令人敬佩！”抚今追昔，胡邦定一脸崇敬地说，王勃在《滕王阁序》的名言：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用在西南联大教授身上最贴切不过。

风范长存

西南联大这座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丰碑永远值得我们纪念，而缔造这一辉煌的教授们更让人敬仰，他们的精神弥足珍贵。

抗战中的文化精神丰碑

——纪念西南联大的教授

□徐延宇

重游西南联大旧址，漫步文林街上，依旧人流如织，这里正是当年西南联大师生坐而论道的小街茶馆；远看翠湖公园，垂柳成荫，倒影如镜，这里曾有吴宓先生在日记中常提及的“穿翠湖归”联大教授的匆匆身影。打开历史的卷轴，西南联大办学的画面毫不褪色。西南联大这座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丰碑永远值得我们纪念，而缔造这一辉煌的西南联大教授更让人敬仰，他们的精神弥足珍贵。

不惧艰辛的乐观进取精神

西南联大“以艰苦始，以光荣终”，在艰难时代，教师们的努力创造了“一代盛事，百世难遇”的大学标杆，教师乐观进取，身体力行“刚毅坚卓”的校训。抗战期间昆明物资匮乏，物价飞涨。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甚至无法保证按时发放薪水，教授们生活的贫困可以想见。

教授们各自运用所长贴补家用，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坚守。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在日记中写道：“昆明教育界生活日趋艰苦……月薪不足之数，系由自己补贴。昨闻黄子卿云……原来存款，即将用罄，现连太太私房及老妈子工钱，也一并贴入，同时还当卖东西，以资补助云。”曾昭抡运用专业所长帮人开了一间肥皂厂，制造肥皂出售，算是教授中的“富翁”了，基本能够吃饱，却顾不上穿。脚上的皮鞋常常破着几个洞，他也依旧穿着去上课。学生们曾回忆，有一次，两个女生走夜路，隐约听到后面有异样的脚步声，大着胆子回头一看，发现后面走着的是曾昭抡，只是他的鞋子前面张了嘴，后面开了口，前后见光，走起路来就有了踢踢踏踏奇怪的动静。学生们都戏称曾昭抡的鞋子“空前绝后”，等到脚掌部分再磨穿，既通风透气，又“脚踏实地”了。以苦为乐，不忘幽默，师生乐观可见一斑。

潜心学问、耕耘杏坛的为学精神

西南联大是“大学者，大师之谓也”的最好注释。在极为艰苦的教学条件下，西南联大的教师依然坚持教学和研究，专心育人，学校弦歌不断。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完成了《禄田农庄》《内地农村》等著作；优生学家潘光旦则在村舍里写出了《优生原理》，编译出版了《性心理学》，填补了中国人文科学的一项空白；华罗庚则完成了自己的成名作《对垒素数论》的中文稿。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众多海外归来的教师将当时西方先进的教学方法带到了西南联大，并进行大胆创新。西南联大提倡师生平等对话和进行启发式教学，允许学生跨学科、跨专业自由选课。弹性的学习制度设计，优秀的师资，灵活的教学方法，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资料显示，每当新学年开始，教务处张贴公布全部课程安排，学生们一连几天在课程表前挤来挤去，记下自己要选和想听的课程。工学院的学生有的要走好几里路到校本部听文科的课，学生跨系听课现象蔚然成风。

西南联大常常是几位教授同时开讲一门课，讲授各有特色，风格观点纷呈，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开阔学术视野。教师学术自由，教学严谨，学生得到很好的熏陶。“发现李政道”是西南联大人才培养的一段佳话。1945年，年仅10岁的李政道带着一封介绍信到昆明北郊的岗头村敲开了一间农家的房门，找到西南联大教授吴大猷，希望可以拜在他的门下学习。吴大猷随机出了一些物理题，李政道的回答让其一次次感到惊讶和狂喜。吴大猷爱才心切，破例让李政道在西南联大做旁听生，还在家中“开小灶”。正是吴大猷等西南联大教师的悉心教导，为李政道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7年，李政道曾在给吴大猷的信中写道：“现在的成就大部分是源于在昆明时您的教导，假如在1946年您没有给我这个机会，那就根本不可能有我今天的光荣。”

西南联大简陋的教室

西南联大三校教师由北而南颠沛万里，不畏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几次搬迁，正是这批优秀教师的耕耘，造就了各行各业的不少国家栋梁之材，其中有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有数学家华罗庚，有两弹元勋邓稼先，有光导纤维之父黄宏嘉等。

知识报国的抗战爱国精神

西南联大的教师们在艰苦的年代为中华民族续存了文脉，培养了人才，更为难得的是这些教师关怀国事，时刻牵挂着国家民族的命运，为抗战救国服务。教授们面对亡国之忧，或者更坚定地埋首在书斋中，通过学术研究寻找救国救民的办法，或者振臂疾呼，引导学子和整个社会投身抗战。

1940年初，日军飞机开始频繁光顾昆明，西南联大许多建筑被炸毁。日军知道，西南联大的学者们大多借住在文化巷，所以，文化巷的房屋无一幸免。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生活艰辛甚至有生命危险的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以各自的方式取得了辉煌的学术研究成果。“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他们怀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顽强坚持教学科研的实际行动，感染并激励着当时的年轻学子。

曾昭抡的学生苏勉曾说：“曾先生始终是一个学者，他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政客。他始终相信科学救国这一点。”工学院的教授们主动将研究和抗战需要结合。物理系从事量子力学研究的教授周培源，抱着科学家应为抗战服务、以科学拯救祖国危亡的志向，毅然转向抗战需要的流体力学研究。闻一多誓言抗战不胜，绝不剃须。抗战胜利后不久，闻一多登台就中国未来的走向作演讲，下巴刮得干干净净，刚登台尚未开口，全场便响起热烈的掌声。

伫立在黑底白字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牌前，抚今追昔，我们深深缅怀这所曾经辉煌的大学和大学中令人敬仰的教师，西南联大教师鲜活的个案和楷模，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无限荣光，也让当代教师意识到自己肩头沉甸甸的责任。

（作者系云南大学副研究员）

主编：吴绍芬　电话：010-82296743　编辑：冯永亮　电话：010-82296740　投稿邮箱：zgjs bjyj@vip.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 btp@vip.163.com